

世界文化論壇 Culture Communication

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

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校长 菲利普·克莱顿 博士

我有幸被邀请就“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中国”这一主题进行发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世界上不间断的最古老文明。(相反,我来自新大陆上非常年轻的国家。)并且,中国的变化速度非常之快举世闻名。每个月,中国都会启动一个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新的重大项目。正是中国这种难以置信的变化速度给了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勇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极其复杂,但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在世界范围内找出应对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我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描述西方已经做错的。我很乐意看到中国领导人能够避免西方的这些错误。

1.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科学

我很荣幸代表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这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它一直都践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分解研究高于整体研究、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综合、价值中立研究高于包含人类价值尺度的研究。西方的许多大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的。然而,作为一所后现代大学,我们追求用整体性方法去展开教育。在课堂和项目,我们寻求事实和价值、个人和社会、分析和综合、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平衡。我们的使命是训练领导者能造就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利和全局性的全球合作关系。科学方法是在许多方面都简化的方法。最有力的科学用简单的规则、原始的条件、数学关系解释复杂的现象。我重视科学的这些力量;它们造就了一些人类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并不适合认识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例如,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似乎把自然科学知识

和社会科学知识等同看待。但是他们忽视了科学和文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的不同。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没有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卓越的科学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卓越的,这种评价标准无疑是国际性的。但后现代主义的确要求我们对人类怎样将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做出不同的思考。它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和人类经验的重要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正如我将讨论的合作关系,它对于中国的成功是必不可缺的。事实上,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平衡技术和人类可持续文明之间的关系。

2. 现代主义之后的科学

在现代,尤其在西方,知识和价值是被放在对立面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是不可逾越的。现代哲学家强调价值是人类理想的或者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说,科学研究世界就意味着排除了所有的价值。在过去,教育者认为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知识上和他们的学科领域内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已经足够。他们宣称如果科学家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社会就会获益。

但在后现代世界,我们已经认识到纯粹的为研究而研究是不行的。有时科学家将对知识的追求放在对共同福祉的追求之上,人类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了伤害。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后来在哈佛大学的工作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不能进行团队合作的科学家。这些个体的科学家希望能够独立,他们之间相互争斗。这给大的研究组织造成了许多问题。因为团队利益必须高于个人的利益。这样的事在西方的研究机构经常发生。当一个科学家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他更容易做出不道德事情,他会歪曲数据或着在

没有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就将结论迅速发表。

新的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是必要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邀请了诺贝尔生物化学奖获得者杜赫提(Peter Doherty),来举办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论坛。杜赫提博士总结了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当他发言完毕后,走近观众群中的宗教领袖,并请求得到他们的帮助。杜赫提博士说,我不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士,但是我知道宗教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能更深层次地唤起人们帮助我们推广这个信息。之后,请使用宗教的力量来使得你们的全世界追随者做出真实的改变。

这些话中蕴含着大智慧。如果人们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的话,他所寻找的结合形式是非常关键性的。对比而言,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使得人类无法完全地回应这一变化。正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一株孤零零分开对立的房屋是不能持久地的。如果因为科学家与宗教人士持续对立的话,我们就不能建设和谐社会。

只有当人类寻找到一个科学与文明深层次的交汇之处,我们才可以达成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后现代科学家、哲学家和古老的中国文化建立合作关系。但这意味着伟大的科学家必须在大学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科学与技术的教育;另一种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想想以下三个例子:
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数量的减少如何使得生态系统减弱。但这仍需要精神与美学的训练才能使们领略到大自然的内在的美丽以及更深刻地懂得我们身旁的世界。

医药科学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帮助人们明白生命的品质。人文传统对于评判一个人好坏

与否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并且可以使得人的生命在最后一天里过的更加充实与人性化。

科学给了我们设计城市、建筑物与道路的伟大工具。但是,要建设一个使市民有幸福感的城市则需要智慧。人文传统对于人们的基本需要有深层次的了解。只有我们懂得了这些社会性需要我们才能建设使得人类繁荣的城市。

3.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就拿现代主义思想的例子来说。许多年来我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源地——欧洲的思想界,马克思所依据的辩证法框架是由之前150年里大多数的德国哲学家(莱辛、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发展的。但是这些思想家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是相对于身体而言更强调心灵、相对于自然而言更强调精神的一门哲学。最终,到1843年,一个名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德国哲学家扭转了唯心主义。德国唯心主义者谈论的是上帝,而他谈论的却是人类。当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谈论精神或心灵的发展时,他却是在谈论精神赖以生长的人的身体以及必要条件。当马克思在撰写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他以同样的观点开始他的学术生涯。这一新的强调人性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了解了生产所需的物质条件,经济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我们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他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但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并没有克服他们前辈的现代性。他们仅仅从一边转向了另一边而已!在这两个德国人的思想成果中,思想、文化、哲学、宗教被称之为上层建筑,建立在生产力这一物质条件之上。同其他(下转第2版)

本期主要内容

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	第1版
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审美启蒙	第1版
开启“启蒙之蒙”	第1版
对基础教育对立问题的过程哲学分析	第2版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生态农业(中)	第3版
走中国特色的厚道发展之路	第3版
发现乡土性(上)	第4版
贴个标签真有那么难吗?	第4版
善待自己	第4版

开启“启蒙之蒙”

——《第二次启蒙》阅读札记
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 鲁枢元

(一)

一位哲人曾说:过于强烈的光亮不仅使眼睛迷乱,也会吞噬掉一切自行显示者,制造出比幽暗更普遍的黑暗。启蒙理性的悲剧也正在这里。过去300年里,笛卡尔式的启蒙理性之光已经使人类陷入“整体的无明状态”,启蒙的结果竟制造出弥塞天地的“启蒙之蒙”。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证实,现代人已经陷入日益困窘的生存怪圈。

王治河、樊美筠新近推出的力作《第二次启蒙》,其笔锋所向即“开启‘启蒙之蒙’”。书中受理了为启蒙理性障蔽的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教育、民主、自由、人权、性别、法律、道德,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问题,并悉心勾勒了改弦更张的蓝图。在这本书中,他们把怀特海奉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实际上,

《第二次启蒙》也是对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扩展、深化与落实。其中既有他们在美国克莱蒙特后现代研究中心十年专心治学的心得,更有他们对中国当下现代化坎坷进程的切身体验。

(二)

启蒙运动在中国,至今也还是历史界的一团迷雾,同时又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焦点。在中国历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发轫于“中国本土资本主义萌芽期”,明代万历年间的何心隐(1517-1579)、李卓吾(1527-1602)已被赋予反抗封建、破除迷信、注重经济民生、倡导社会平等、呼吁个性解放、开启市井启蒙的启蒙思想家称号,比欧洲的培根(1561-1626)、笛卡尔(1596-1690)还要早若干年。但更多人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肇始于清末民初,即“五四”运动前后,是对西方启蒙理念(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科学、民主、工业化、城市化等)的引进与实施。《第二次启蒙》针对的前“启蒙”,显然是后者。这些作为“舶来品”的启蒙理念,一旦融入中国现实政治,受各种意识形态的左右,遂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启蒙”如今仍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界、思想界乃至文艺艺术界一个冲突而又沉重的话题,充满了意见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80年代曾经开展过两次“启蒙运动”,但都未成功,封建专制势力根深蒂固,目前

亟需坚持启蒙原教旨的普世理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启蒙运动进行到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科学繁盛、经济富强、民主自由的现代型国家。具体的目标是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政治全球化。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思想界的左派、右派、正统派几乎都是一致的。一度被当局视为政治异端的哲学家李泽厚,由于固守人的实践力量与代理性的力量预设出“站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反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纳。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那种以工业化、现代化为指归的正统启蒙理念已危机四伏、陷阱重重,甚至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从社会实践看,正统的启蒙理念对地球的自然生态、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情感与精神领域以及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人们应当正视现实、接受教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念,启动一次针对此前启蒙理念的启蒙,在前进中建设一个新时代。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王元化先生,从90年代开始了对于“启蒙”乃至“新启蒙”的深度反思。“科技”、“市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之类的“普世理念”,在晚年的王元化这里成了“需要反省其负面性的对象”,这使他超越了正统的启蒙期”,明代万历年间的何心隐(1517-1579)、李卓吾(1527-1602)已被赋予反抗封建、破除迷信、注重经济民生、倡导社会平等、呼吁个性解放、开启市井启蒙的启蒙思想家称号,比欧洲的培根(1561-1626)、笛卡尔(1596-1690)还要早若干年。但更多人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肇始于清末民初,即“五四”运动前后,是对西方启蒙理念(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科学、民主、工业化、城市化等)的引进与实施。《第二次启蒙》针对的前“启蒙”,显然是后者。这些作为“舶来品”的启蒙理念,一旦融入中国现实政治,受各种意识形态的左右,遂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启蒙”如今仍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界、思想界乃至文艺艺术界一个冲突而又沉重的话题,充满了意见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80年代曾经开展过两次“启蒙运动”,但都未成功,封建专制势力根深蒂固,目前

亟需坚持启蒙原教旨的普世理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启蒙运动进行到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科学繁盛、经济富强、民主自由的现代型国家。具体的目标是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政治全球化。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思想界的左派、右派、正统派几乎都是一致的。一度被当局视为政治异端的哲学家李泽厚,由于固守人的实践力量与代理性的力量预设出“站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反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纳。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那种以工业化、现代化为指归的正统启蒙理念已危机四伏、陷阱重重,甚至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从社会实践看,正统的启蒙理念对地球的自然生态、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情感与精神领域以及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人们应当正视现实、接受教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念,启动一次针对此前启蒙理念的启蒙,在前进中建设一个新时代。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王元化先生,从90年代开始了对于“启蒙”乃至“新启蒙”的深度反思。“科技”、“市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之类的“普世理念”,在晚年的王元化这里成了“需要反省其负面性的对象”,这使他超越了正统的启蒙期”,明代万历年间的何心隐(1517-1579)、李卓吾(1527-1602)已被赋予反抗封建、破除迷信、注重经济民生、倡导社会平等、呼吁个性解放、开启市井启蒙的启蒙思想家称号,比欧洲的培根(1561-1626)、笛卡尔(1596-1690)还要早若干年。但更多人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肇始于清末民初,即“五四”运动前后,是对西方启蒙理念(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科学、民主、工业化、城市化等)的引进与实施。《第二次启蒙》针对的前“启蒙”,显然是后者。这些作为“舶来品”的启蒙理念,一旦融入中国现实政治,受各种意识形态的左右,遂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审美启蒙

樊美筠

迥异于现代第一次启蒙对美特别是自然美的打压与放逐,后现代的第二次启蒙呼唤美与自然美,它高扬美的重要性,将美看作是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审美启蒙。

一、第一次启蒙对美与自然美的放逐

美特别是自然美的命运在现代社会的被放逐呢?依笔者看来,第一次启蒙,也就是发生在17世纪欧洲的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特别是其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主义态度、对农民的蔑视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对科学和理性的盲目崇拜以及支撑这一切的现代机械哲学世界观,才是美和自然美遭到要黜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

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他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摒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

二、第二次启蒙对美与自然美的热望

第二次启蒙的这种生态意识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与恒星,微风,岩石,土壤,植物,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古老的智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充斥大脑的现代人给遗忘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及“民胞物与”思想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态意识。在中国学习多年的世界著名生态学家托马斯·柏勒(Thomas Berry)最欣赏中国人别开生面地将“人”理解为“天地之心”的思想。因此,心系大自然,为天心地操心,就成为人的天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要说:“古典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

因此,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或曰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后现代启蒙,在根本上它是一种生态启蒙、审美启蒙,因此高扬生态意识和审美智慧就成为第二次启蒙的两个核心特征和重要理论内容。

1.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高扬生态意识

鉴于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启蒙意在超

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他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摒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

第二次启蒙的这种生态意识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与恒星,微风,岩石,土壤,植物,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古老的智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充斥大脑的现代人给遗忘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及“民胞物与”思想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态意识。在中国学习多年的世界著名生态学家托马斯·柏勒(Thomas Berry)最欣赏中国人别开生面地将“人”理解为“天地之心”的思想。因此,心系大自然,为天心地操心,就成为人的天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要说:“古典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

因此,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或曰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后现代启蒙,在根本上它是一种生态启蒙、审美启蒙,因此高扬生态意识和审美智慧就成为第二次启蒙的两个核心特征和重要理论内容。

鉴于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启蒙意在超

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他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摒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

第二次启蒙的这种生态意识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与恒星,微风,岩石,土壤,植物,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古老的智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充斥大脑的现代人给遗忘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及“民胞物与”思想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态意识。在中国学习多年的世界著名生态学家托马斯·柏勒(Thomas Berry)最欣赏中国人别开生面地将“人”理解为“天地之心”的思想。因此,心系大自然,为天心地操心,就成为人的天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要说:“古典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

因此,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或曰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后现代启蒙,在根本上它是一种生态启蒙、审美启蒙,因此高扬生态意识和审美智慧就成为第二次启蒙的两个核心特征和重要理论内容。

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他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摒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

第二次启蒙的这种生态意识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与恒星,微风,岩石,土壤,植物,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古老的智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充斥大脑的现代人给遗忘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及“民胞物与”思想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态意识。在中国学习多年的世界著名生态学家托马斯·柏勒(Thomas Berry)最欣赏中国人别开生面地将“人”理解为“天地之心”的思想。因此,心系大自然,为天心地操心,就成为人的天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要说:“古典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

因此,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或曰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是一种后现代启蒙,在根本上它是一种生态启蒙、审美启蒙,因此高扬生态意识和审美智慧就成为第二次启蒙的两个核心特征和重要理论内容。

鉴于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启蒙意在超

征 稿 啓 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
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劉全華 曲躍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策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唐力權 鞠寶兒 安樂哲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顧問:葉秀山 叶明 朱德生 周桂鈿 乐黛云

基础教育对立问题的过程哲学分析

【山西太原】 吴金生 吴裕民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基础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对立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阻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教育对立问题产生的背景是当下的文化、社会、教育焦虑所导致的功利化教育，而其哲学根源实为彼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方式，即认识论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教育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转换思维方式。因此，应当从哲学层面对当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此，非需要一种大智慧不可，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智慧。本文拟在过程哲学视域中对基础教育对立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途径。

一、教育对立问题的若干表现

1、教学与教育的对立。如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忽视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导致学生关心他人的意识淡薄、缺乏对人生价值追求的思考和对人类文化价值的理解。如教师单向度地向学生灌输知识，“知识”成了教师的全部主宰，成了教育的最高的目的，将教学窄化为传授知识的代名词，导致学生仅仅关注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而远非对知识的内在渴求。

2、教师与学生的对立。如教师站在成人世界“我为你好”的“道德制高点”上，不管学生的内心如何痛苦，强行将其绑架在知识学习的战车上。如严加限制教师讲课时间，以教师少讲等同于学生多学，个别学校甚至因此规定上课铃之后严禁教师进教室。如某些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出于所谓教学改革目的，违背教育规律，片面夸大“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所谓理念。

3、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对立。如因担心影响教育公平而不敢理直气壮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忽视学习困难学生和超常学生的资质和个性差异，不顾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用千篇一律的要求教育学生，严重制约了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增强。

4、继承传统与教育改革的对立。如将传统教学模式置于现代教学模式的对立面，认为传统课堂是一种毒药，是一种罪孽，“说中国教育‘杀人’实在不为过”，主张对传统课堂要象旧城改造那样，推倒重来。

5、教育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的对立。政府的教育决策历来大都强调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忽视个性和潜能发展价值；政府只重视即时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或者轻视教育的长期效益，整个社会还存在高低贵贱之分，等级制、官本位现象还非常严重，造成了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与学生在利益上不一致，导致社会、学校、学生评价等诸多对立。

教育对立问题的存在，遮蔽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引发了教育多样性的退化，干扰了国家教育方针及素质教育的实施，造成极端应试教育的盛行，阻碍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两极思维”的过程哲学分析

当代基础教育为什么出现如此之多的对立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在解决教育问题时所依赖的教育思想或者说理论，许多就是来自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思维。

因此，教育对立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从事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人从哲学层面对教育问题做深层理解，而且亟待“哲学家出场”（王治河）。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提供的就是用“处理现代世界的理智和文化体系”的“对世界的一种不同思考方式”。怀特海批判了以物质实体为前提的二元论哲学。他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只能把我们引到某种孤立的实体之中，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这正是二元论哲学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的”、“两极端思维”，抑或折衷的“中庸之道”思维无法正确处理教育关系、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对立问题的原因。

怀特海改造了物质实体这一前提，提出了事件（event）第一性原理。在他看来，

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是事件，这些事件是有机统一，它们与作为环境的其他事件内在关联。“每一个这样的事件在其发生的瞬间都是主体，都是把过去融入了自身，并积极地构造自我，以便反过来影响其未来。一旦它得以完成，它就成为了继发性事件的客体。这样，怀特海就克服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怀特海这一反实体哲学是以事件为存在前提的，即世界最终不是由实体组成的，而是由事件和过程构成的；世间万物在生成，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万物皆流，也皆在过程之中，也势必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在这样一种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生成”的过程哲学思想，对于世界和生命是以过程思维和关系思维考量的，关注的是世界和生命的交织、相关等特性，即个体性与相关性、一和多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怀特海进一步以“摄入”思想来消解二元对立。他认为，每一事件（即怀特海所谓“实际实有”）必须是从以往的实际事物中创造出自己，它必须将那一过去吸收进自身。

过程哲学作为一种反实体思维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过程思维和关系思维方式，对于廓清由于二元对立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浸淫已久的中国教育理路，进而解决教育对立问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三、过程-关系视野中的教育

美国著名学者马尔康姆·伊万斯（Malcolm Evans）在谈到怀特海教育哲学的影响时指出：“怀特海的教育哲学对现代时代的影响，是后现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怀特海在他的《论教育的目的及其他》（1929）一书中，对于教育关系整合方面有着非凡的洞见，如他主张的教育多元性和差异性，就是对传授知识和启迪智慧、倡导自由和遵守纪律、科技和人文教育等诸多对立的克服和超越。以怀特海过程思维和关系思维观照教育，在于教育领域非此即彼“两极思维”的纠正中，认识清楚教育体系中各种教育关系的理路，以最大化地消除教育对立问题，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因时施教是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

怀特海洞见了“生命在本质上是周期性的”这一命题，将人的受教育过程具体地分为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运用阶段，并据此原理进一步具体研究了幼儿期、青年期、大学期“教育节律”的具体特点。这个从生命的节奏性把握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原理，被曲跃厚、王治河博士“理解”为“因时施教”，这是堪与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中“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相互生发、相映成趣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智慧。如被基础教育界长期淡化的教育衔接问题，其实际上就是对教育节律、因时施教的教育规律的把握问题。

深入理解和应运教育节律、因时施教的教育规律，可以有效解决不同阶段教育衔接难题：一是准确定位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关系，避免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可能化解教育竞争和学习负担无限下移的教育矛盾；二是准确定位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关系，避免小学课程内容“难、繁、偏、旧”的倾向，可能化解学习负担长期难于减轻的教育矛盾；三是准确定位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关系，避免高中教育内容同一性和强制性过强的倾向，可能化解大学生教育起点过低的教育矛盾。

2、实现新质是教育创新的取向尺度

怀特海认为，宇宙的进化和文明的进步都必须有历险，“纯保守的力量是和宇宙的本质相抵触的”。教育的传统与变革关系也当作如是观，教育的每一种创新都是对传统教育模式和现有教育秩序的突破，自然也是一种历险。怀特海认为，秩序和创新并不矛盾，秩序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秩序，即一种必然包含着新质的秩序。如果一种秩序不能迈向更高的秩序即不能实现新质，那么它就应当变革这种秩序。这里面有一个变革尺度把握的问题，能否“实现新质”应该是一个标志。

怀特海有一句名言：“进步的艺术就在于既维护旨在变革的秩序，又维护旨在

秩序的变革”。面对整个教育模式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异常艰难的局面和“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无奈，应用秩序和创新理念，在把握变革尺度的前提下突破教育瓶颈，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变革传统和回归本原之左右为难的困惑：一是以变革为取向，恰当衡量传统教学课堂与现代教学模式，取长补短，避免一刀切。如一窝蜂模仿山东“杜朗口”课堂模式，风暴式的推倒讲台，“下放”教师，学生说了算。二是以变革为取向，兼顾应试学习与素质发展的教育功能和群众需求。如北京22中孙维刚老师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的教改实验，既做应试教育的成功典范，又成为素质教育的先进楷模。三是以变革为取向，既保证现行高考制度的公平，又体现全面评价学生的高导向。如巩固已经进行了10年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成果，坚持素质教育取向，走出“戴着镣铐跳舞”的困境。

3、生活与实践是教育活力的惟一源泉

怀特海始终认为，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也就是说，生活与实践是教育的惟一源泉。将生活与实践当作影响教育生成活力的核心元素，进一步强化其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促进若干教育关系的改善：一是以生活与实践为基石，将学生的心智和知识联系起来，重视知识在实际生活环境中的应用，以保持知识活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二是以生活与实践为纽带，将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联结起来，“通过构建后现代主义课程来整合现代思想和各种传统的精华”（柯布先生建议），在“把握三者必要张力、实现最佳平衡”（曲跃厚、王治河博士语）基础上，以裨补个体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生活能力教育的缺欠。三是以生活与实践为钥匙，将教育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联系起来，把教育着眼点放在对“现在”（即生活）的理解上，以纠正现代教育只注重知识灌输、忽视智慧启迪的片面性，教会学生积极地创生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

（上接第1版）的现代哲学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修复之前形而上学哲学家所丢失的平衡，他仅仅是转向了另一个不平衡。

马克思主义从西欧诞生，传播到东欧以及俄罗斯，最后到中国时已经修正了这个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逐渐地从现代模式转向了后现代的模式。例如，马克思主义本不适合于俄罗斯的国情，俄罗斯当时还基本是农业社会。因此，列宁与斯大林创造了一个适合于当时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该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俄罗斯人民最根本的需要。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需要让它从文化上适合当时的情况，也就是将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马克思的很多理论见解都具有建设性意义，但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尽管受到来自俄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也并非适用于中国国情。政治理论家很早就意识到毛泽东思想广泛吸取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精髓。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后现代化。毛泽东对农村问题的聚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自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一种自然有机的延伸。在中国，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后现代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相比之下，我必须对我国的“现代主义”预设持批判的态度。很多美国人认为你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的失败意味着他的不努力。他不应该得到社会的帮助，因为他的失败是自身造成的。这种现代主义哲学被称作“没有安全网的资本主义”。现代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会满足人们的需求。来自政府的无“安全网”社会政策是必要的。

然而这种现代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市场竞争会带来有利因素，同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世界期待中国能够给出一个独特的答案——一种通过社会政策来平衡市场需求的“道家经济”。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两种相立的哲学观：自由资本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中国领导人能够找到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这种平衡吗？

4. 培养后现代文明时代的领导人

中国面临很多抉择，这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的发展。10年内，中国几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因此它的决定同样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拥有超过13亿的人口，如果单纯的效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结果势必是毁灭性的。如果追求的只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那么对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将是毁灭的打击。

这就是世界如此关注中国如何做抉择的原因。对中国人来说，诱惑很多。在西方，每个国家都拥有强大的

实力和财政保障，人们渴望更加舒适、轻松的享受型生活。因此，能耗和浪费增加，消耗比率激增，成直线式上升。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诱惑也同很多。那么，在现代中国，中国会做得比西方更加明智吗？

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中国成为后现代或是“生态文明”国家。中国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采用后现代组织发展的原则进行国家建设。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现代时代。如果有这种可能，那只有中国，因为它已经有2500多年的中央集权与合作的传统。即便是古代帝王也认为他们是代表上帝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古代传统被中国人保留至今。

我们该怎么做呢？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犯的这些严重错误吗？作为一名中国观察员，我认为只有你们自己丰富明智的经验才能引导你们作出正确的决定。

对于普通人来说，当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或工程师已足够。但对于国家未来的领导人来说，学术、商业乃至更多的能力则是必需的。柏拉图，西方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说过，领导者必须是哲学家。“哲学”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爱智慧”。所以他强调，“让一个爱智慧的人成为统治者。”

那么人们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智慧，如何学习什么是智慧？当然这不是来自现代时期西方的世界观！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从印度的传统哲学，或许从亚伯拉罕的宗教伦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学习智慧。但主要的智慧源还必须是中华文化、中国经典著作和中国的传统智慧。这些伟大的经验将直接通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如果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熟知中国古代传统智慧并且知道如何将它们应用到当今的世界，那么才能成功。这同样适用于企业、大学教育、服务业和政府决策部门。

中国学者已经把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观点与科学和技术的需求结合起来了。我认为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一结果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把两者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一旦成功，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将是一盏明灯，照亮世界，给所有国家展示什么是后现代文明和生态文明。中国有巨大的文化资源可以利用。

社会需要科学和技术来为人类和星球的共同福祉扮演一个仆人的角色。科学和技术可以从传统的精神世界中学习伦理和价值观。儒家思想、道教、佛教每个教都是适度的，抵制自私和服务整体利益的。这些传统智慧可以作为科学和技术明智而有灵性的老师。它们可以帮助科学家学会在当代社会中起积极的作用，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5、科学和价值观如何推进后现代文明如果我们把道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作为后现代文明的模型会发生什么？为了更实用和具体，我把重点放在了官方提出的“生态文明”的概念上。

作为科学家，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数据？物体如何工作？它们为什么要以

这种方式工作？我们怎样才能基于当前模式和法律来预测未来？因为科学家仔细地收集和分析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数据，所以科学家能很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全球变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问相关科学家。他知道地球的大气为什么会变暖。如果一个地区的温室气体持续以目前百万的速率增加，那么他就能预测未来的温度将会上升多少。（我推荐控制碳排放的350环保组织www.350.org，它能提供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数据）。这样科学家就可以确定有多少冰川和极地冰帽会由于温度上升而融化。这样就能够预测全世界的海平面上升多少，并计算出世界上对特定地方产生的影响，例如孟加拉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知识或信仰能接近科学的准确性。这些知识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伟大的礼物。

虽然艺术家、伦理学家和宗教人士不能准确地知道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但他们也有所贡献的；艺术家教我们看到周围美丽的世界；伦理学家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行动的价值取向。宗教给我们提供了智慧，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科学和技术教会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做事；在这些其他领域，我们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它是有价值的，应该如何知行合一地生活。还有很多例子，传统儒家哲学中的“礼”（“正确的行为”），或道教哲学中的“平衡”，或佛教中慈悲的教义，或印度传统的优雅猜想。在西方宗教中，如果人们想要生活的幸福和成功，相信上帝，上帝就会指导人们应该怎么去做。世界上大多数的传统宗教也提供这样的观念，重视自然并且爱护自然。

当科学和道德或宗教通过这种方式相互学习，您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互补出现。当我们想知道事实和预测，我们可以去求助科学。当我们想找到了更深层的动机去听那些事实并且采取适当的行为，我们就得去找各种宗教了。在后现代世界里，那就没必要进行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争斗了。你不要再有别的选择了，除非那个世界没有月亮但没有太阳，或者只有男人但没有女人。

6、结论

我希望西方能教中国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学来建设生态文明。但是，我必须很遗憾的说，西方国家没能成功地完成这个紧迫的任务。因此它落到西方以外的南半球国家的了，去了印度，特别是中国——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后现代文明。因为我的国家未能完成这项紧急任务，我不能作为一个权威，但我会有一个朋友的身份尽我的绵薄之力。我会给你们提供我的大学和日益增长的整个美国的进步思想资源，来支持你们完成这一伟大的工作。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在这个星球上享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和一个领袖角色去创建可持续的文明。（*此文系克蒙顿校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篇幅有限，本报有删节，译者山西大学白如斌）

（上接第1版）一次启蒙中卢梭设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第二次启蒙努力的方向则是“人与自然契约”，即法国环境哲学家M·塞尔指出的：人类必须放弃过去的无视自然的社会契约，建立与自然相互协调共生的“自然契约”（lecontrat naturel）。《第二次启蒙》一书中也强调：“整合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关系，是克服现代人无根浮萍状态的根本之道”。这就是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同时又是坚定的“生态主义者”，甚至还是“深层生态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实施的是对现代文明的宇宙观、价值观的彻底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反思，他们还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作出伦理的、法律的阐释，从而彻底改变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建构与以往不同的生活模式，这当然是一个宏大而又艰巨的构想。怀特海的哲学，尤其是他的《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文版译为“近代世界”），为这一新契约的制定提供了哲学前提。而王治河夫妇的这部书，或可看做为一契约精心构划的具体蓝图。

(四)

启蒙重在精神取向的转换，观念的转换，心灵的感悟，内在情感的发挥。令人沮丧的是，包括心灵、情性在内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均在第一次启蒙的强光照耀下物化了，被硬化了。变革需要哲学，当下这哲学也已经弄得灰头土脸。这就为第二次启蒙设置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二次启蒙要想突破重围取得进展，就必须重振哲学的声誉，重新确立自己的出发点。

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在最初的启蒙思想家那里，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的关系总是对立的，此前的社会形态总是黑暗、落后的，应当无条件地予以摒弃；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总是对抗的，东方民族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全盘接受先进的西方文明。王治河以及他的同事们一反成见，他们坚信在建设后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必须借助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是前现代历史演替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二是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自然主义哲学传统中的生存智慧。

后现代如何对待前现代，西方如何看待东方，事关地球人类今后的命运。在这样两个位于出发点的预设前提下，第二次启蒙旗帜鲜明，与第一次启蒙截然相对。

(五)

在中国，王治河樊美筠的“第二次启蒙”，既不同于19世纪末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

第一次启蒙，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拨乱反正”为旗帜的“新启蒙”。尽管他们在自己的行文中尽量避免使用“颠覆”、“革命”这样一些高调词汇，但我总感到他们仍然是谋求彻底改变现代人持守的各种观念、全力撬动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整个根基，从而建设一个与以往远不相同的“新建”。对于他们反复强调的“重建”，我的理解：部分建筑材料仍可以使用，但前前的“基础”需要从根本上清理，原有的“架构”也必须重新设计。比起那些肆无忌惮的解构性后现代思想家，他们还将挑起一副重担“宏大叙事”的重担，其面临的困难与险阻可想而知。

如果说当下中国举国上下尚在致力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二次启蒙》要做的却是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对于当下中国改革激进派趋之若鹜的“理性”、“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市场”、“教育”等普世价值原理，《第二次启蒙》一书站在有机过程论哲学与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的立场上，一一列举了他们的疏漏与弊端，同时还一一规划了矫枉与补救的路径。从二位作者的精神气质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第一次启蒙运动先驱者的某些品格，如卢梭的知觉敏锐，心地善良，浪漫情性，诗化文体；圣西门的鸟瞰时代，无私无畏，精心筹划，献身精神。而他们实际上的历史担当也丝毫不比他们的前辈轻松。

客观地讲，第一次启蒙在当下中国尚且远未完成，中国主流思想界关于现代化的诠释，甚至还停留在怀特海之前，如：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专业化的钟情；对发展速度的追捧；对量化管理的倚重等等。往昔之“蒙”尚未有效开启，资本的残酷本性与之权力的极度集中相谋，已经在黑暗中又催生许多新的腐恶。第二次启蒙在中国面临的境遇更加复杂，启蒙者的道路更加艰难。

许多中外“后学”专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浪漫主义在许多方面恰好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和思想源泉。如此看来，东方式乌托邦的“桃花源”，也应当成为“后现代浪漫”的先河。

《第二次启蒙》设置了专节为“后现代浪漫主义者”正名：“后现代浪漫主义者寻求的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他们推重精神生活，不向生存现实状况屈服；他们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希望通过一种崇尚自然的简朴生活。他们是一些‘能够细细品味自然的人’、他们又是一些‘人性丰满、呵护精神尊严的人’。他们有理性和不机械，有诗意但不矫情，这是一群勇敢地‘活出

生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的人，一群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人。书中还推出一位“后现代浪漫主义者”的楷模——诗人、散文家、世界著名有机农机的先驱与精神领袖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就是这样一位活出自己生命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被现代文化大潮裹挟时，温德尔为拒绝现代化的绑架，毅然辞别令人羡慕的大学教职和城市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乡下落地生根，当上农民，开始其有机耕种的乡村生活。40余年后，他再未离开，并写下了20余本诗集、小说以及散文集。

任何一位中国读者看到这位诗人身上，都会自然想起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从西方传媒界的一些报道看，在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后现代浪漫已经暗潮涌动，也许已经开始营造当代人的新的生活情调、新的生活风格。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诗歌国度，有可能为此提供更多的绿色资源。

(七)

欧洲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把“理性之光”视为启蒙的制胜法宝，结果反而酿下现代社会的“整体无明状态”。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先行者能否避开笛卡尔、培根们“光明主义”的偏执呢？

“第二次启蒙”既是“开启‘蒙昧’”，尤其是开启第一次启蒙制造的“蒙昧”；同时也是守护、精心守护自然与历史幽微未明领域的隐秘。

用古代中国首席哲学家老子的话说，那就是“明道若昧”、“大白若辱”，“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佛教的凌霄、净土；基督教的天堂、天国，都是一片光明的琉璃世界中；唯独在老子原初的道家哲学里，将混沌视为至高无上的境界，老子本人也被后世的教徒加封为“太上混元皇帝”。道家的仙府是在“洞里”，三十六洞天，其中就有“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闭”的“桃花源山洞”。中国道家“洞天福地”是一个明暗相守的理想世界。

人们大多认为，《老子》一书中玄之又玄的话语，其实更接近于宇宙本体、世界本源的自然哲学；中国古代神话中还有一则好心开凿混沌而导致混沌死去的故事，似乎也都暗含了整体论有机哲学的精义，皆可资当代启蒙者借鉴，在开启中守护，在扩展中凝聚，在幽暗中闪光，在回归中前进。

衷心祝愿我们的第二次启蒙者为多灾多难的地球人类开拓出一个“清新美丽的新世界”。

反思西式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的厚道发展之路

——温铁军教授与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博士对话录

【编者按】应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柯布博士邀请，中国知名学者，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2012年来美发表演讲。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校长克莱顿博士于稍后时间亲切会见了温铁军教授，双方就美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之间展开学术交流进行了座谈。演讲前，两位重量级学者就西式现代化的局限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美国环保署前高级官员瓦连纳托斯博士，著名后现代农业先驱弗洛伊登博格博士以及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参加了会谈。本报将他们的对话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刊发于此，以飨广大读者。】

柯布：欢迎你到克莱蒙特来。从我的中国同事王治河博士和樊美筠博士那里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我们很钦佩你推动中国乡村建设的可贵努力，你的许多思考和我们的很接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向你请教。

温铁军：您是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也是西方世界绿色GDP的最早提出者，对现代化的反思比我们早的多，也深刻的多，能够亲自向您请教是我的荣幸。

柯布：谈到现代化，据我的了解，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其实这个“现代化”是个西方版本的现代化。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性。可惜的是，许多人依然把他看作普世的，一门心思模仿它。温铁军：是的，我们今天谈的现代化是个非常特殊时代的西方文化的产物。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西方人实现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300多年的长期殖民化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向殖民地转移过剩的人口，化解了老欧洲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宽松的资

源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占有殖民地的丰富资源，西方国家从殖民地

大量向本土回流资本收益，使之得以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因此，西方的现代化实际是以殖民化为实现手段的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过程。而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这种发展路径实际是不可重复的。

柯布：这是一种建立在掠夺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是一种不义的现代化。我们西方的确亏欠前殖民地国家也就是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太多。温铁军：假定300年的殖民过程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而这客观上也是形成西方环境中的“现代化”话语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就不能仅是将这些话语拿过来就用，而不去仔细考虑这套话语是如何形成的。相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西方语境中的“现代化”是否适合于中国。

柯布：其实，这种西式现代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证明它是成问题的，不具有普世性。因为这种现代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就是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从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每个人实际上主要是社群的产物。当个人用自己的自由去削弱社群，那么一定会进一步削弱自身。现在人们需要的是如何在个体和群体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一个人只有在健康的社群中才能强壮、自由。健康的社群是由自由负责的个体组成的。

温铁军：无论是走现代化之路的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无论私有化程度、自由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市场化程度，都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都现代化的多，但它们社会的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亦即我们中国现在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甚至社会矛盾更复杂、更尖锐。

柯布：西式现代化另一最严重的恶果就是环境恶化。非常悲哀的是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视这一点。所以在现代思想庇护下的现代化全都恶迹

斑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学原则忽视了自然界，结果情况更糟糕。未来结果的恶劣程度无论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中国的困境非常尖锐，以后还会继续尖锐下去。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而这个进程已经很明显地给我们的星球带来了破坏。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现代化已经给全球能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国家不但在剥削第三世界的能源以满足自己的奢侈，而且是在透支整个人类的未来。

中国的现代化非常成功。可是，这种成功越大，整个地球的压力就越大。中国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中国沙化的面积正在扩大。全球气候变暖存在导致西藏水资源枯竭的危险。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如果想遏制空气污染，就难以保证众多城市和工厂的能源需求。很明显，随着全球渔业资源的不可持续，一个很重要的食物来源将会枯竭。水资源的贫乏也会和其他因素一起导致食物产量的降低。中国目前采取的一些短期解决方案，只能使得从长远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简而言之，全球面临的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其严重。几乎可以肯定，10年之后这些问题会更加严重。

正是西式现代化所倡导的掠夺式的发展，造就了今日全球的生态危机。可以断定现代西式发展模式注定是要垮掉的，现代大都市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麦基本在其新著《即将到来的地球末日》中也指出，生态灾难不可避免，而且已经逐步展开了；我们曾经熟知的星球正在以融化、旱化、酸化、洪荒、野火等各种人类从未目睹的方式被损毁。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弦更张。

中国要有未来就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温铁军：“经济增长”曾经被我们视为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消费成为了现代化的唯一目标。而经济发展又被理解为GDP增长。

柯布：其实GDP的成功增长并不意

味着人们经济状况的改善。它可能意味着我们花了大量的钱来更换我们失去的东西。

温铁军：幸运地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以“GDP的增长”为全部内容的发展，是一种不厚道的发展，以“财富”为首要目标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厚道的现代化。因为它既非以人为本的，也是漠视生态环境的。

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概念，意在挑战现代西式发展模式，建构一种认真考量环境并将民生放在首位的厚道发展模式。其中包括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消费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

柯布：这很令人鼓舞。早在1972年，我们就在克莱蒙特召开了一次会议，叫做“灾难的出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我所关注的焦点。很遗憾，我的那些建议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并没有获得我们西方领导人的重视。很高兴看到中国向生态文明，向后现代化的转变。

一种厚道的发展，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要经济上“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类的福利放在第一位。实际上，这还不够。因为人类的福利依靠世界上其他生物的福利，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全部生命的福祉，然后再考虑如何设计一种经济体系来满足这个目标。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当把经济秩序作为人类福祉的一个因素。比如，教育应该从整体上服务人类，服务经济秩序，因为它有利于全球的福祉。健康资源的投入应该以最能有效处理全人类需要的方式来使用，而不是根据有钱人的意志来使用。公正的问题和财富增长的问题应该得到同样程度的重视。可持续性是中重之重。

温铁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不断膨胀、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特别是有8亿农民的存在，因此倡导这种厚道发展尤为必要。但要实现这向厚道发展的转变，我们首先必须限制资本，破除市场崇拜。

柯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一直比较青睐大市场。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样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可以实现最

高效的生产，换句话说，大市场最经济。这些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是我觉得他们夸大了大市场的好处。如果我们采用更准确的标准，我相信地方化生产也不会不经济。

无论如何，我认为经济因素只是一方面。地方生产“可能”对公正和社群更有利。地方共同体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经济，那么就可以自己决定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可以支持工人组织。可以保护自己的环境，可以更节俭地运用资源。而且可以从高收入者那里收税，以支持公共事务。

温铁军：这会不会有走向“地方主义”的嫌疑？

柯布：“地方”有很多意思。从广义上说，地方的意思和全球的意思相对，即任何具备控制自己的经济目标能力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以被认为一种地方共同体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可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不是面向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产品的富足，中国已经开始面向国际市场了。可是，在这个节点上国际的竞争力很强，因为工人很勤奋且工资很低。中国的富足是以对人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为基础的。如果中国把眼光放在国际经济，那么提高工人工作条件是很渺茫的事情。

进一步讲，应该把目标定在从中国内部来改变经济的重心。目前沿海地区的巨大优势是因为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中国内地为中国市场产出更多的商品，内地就不再那么缺乏优势。全球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减小。

我知道如果中国经济把重心放在本土化上，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变慢。产品质量也可能会下降。如果从GDP的角度来理解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发展，那么我的建议就会立刻被否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发展看作就是人类状况的改善（或者更广泛地说，一切生命状况的改善），那么如果以更准确地手段来评价经济在改善人类状况中的贡献，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会有不同的理想模式。社会共同体、公正和可

持续性会成为主要的关注点。地方经济或本地经济可能比目前那些措施要好得多。

温铁军：您对地方经济的推重是个很深刻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把中国的农村建设好就是在发展地方经济了。

柯布：美国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正在面对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重要问题。西方用石油能源取代了人力和自然肥力，中国会不会也这么做呢？如果这么做，可能会多多少少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但是同时会让一个庞大的人群离开土地。那会使农业远远比今天更不可持续。你长期生活在中国，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应该更了解中国的情况。

温铁军：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是城市现有的这一套现代经济制度，对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农村来说，仍然是不适用的。法学家们所设想的现代法制社会，对小农经济普遍化的农村来说，可能也是完全不适用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并且高比例的兼业化经营，农村基本的经济基础恐怕还是目前这个状况，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还是难以实现所谓的现代化。

假设中国到2020年人均3000美元的GDP目标能够实现，而且真的能够让55%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这样大约有8亿人生活在城市，还会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按照现在的统计，农业人口是7亿8000万，到那个时候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不过仅仅减少几千万而已。也就是说，广大农村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

柯布：看来解决中国城乡差别的关键还是要把农村建设好。我们明年的第七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就准备重点探索这一问题。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温铁军：我认为决策者可有两个选择：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型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助之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生态农业（中）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克里福·柯布著 成文杰译 谢琼校

国内经济体系

虽然全球事件影响了农业，但国家经济政策对农业会形成更深远的影响。创建生态农业体系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乡村文化。换句话说，要使大自然表现和谐，就要要求人们尊崇自然的节奏规律。在农村长大的人，对自然的进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明白尽可能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必要性。基于几个世纪的传统习惯，农民推崇环境的长期健康和自然的平衡，因为这种自然平衡能维持他们的庄稼和牲畜健康生长。相比之下，现代的工业化农耕方式倾向于将资金投入于短期效益，却忽视了自然资源具有害虫防治和土壤肥肥的本能。

因而，不需要给农民授予一些生态农业的方法。他们早就知道，如果要在陡坡和梯田上种植农作物，就必须维护其表层植被的生态价值。如果他们违反植被保护原则或往土地上喷洒农药，那只不过是它外部驱动政策驱动短期行为的结果。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农业问题是由农民的无知引起的，相反，这些问题应归咎于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构建者们，农民不过是被迫遵循罢了。

政策的设计必须既能保证足够的劳动力，又能激励农民采取正确的行为。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中央规划者们力推增产的现代农业方法，却只增加了环境污染和土地退化。即使政府培训农民采取科学的农业种植方法，农民也不会接受，除非国家政策对这种无害化的生态行为进行奖励。可是由于政策的影响是复杂而间接的，要制定能带来实质性效果的法律政策并不容易。

为了实现生态农业，中国必须创新经济刺激措施，同步推进：1) 降低农民的税费负担；2) 稳定耕地供应以促使粮食安全；3) 减少水污染，促使水资源的有效使用；4) 保护农田免于侵蚀，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供应；5) 减少农业的化学品投入，尤其是化肥和杀虫剂；6) 减少农村非农业生产的能源消耗。所有的这些目标都已经得到中国的专家和领导所认可。中央政府已经通过法律引导这些资源更加合理使用，但由于还存在着很多需要克服的障碍，这些法律通常发挥不了作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政策，及其在地方上失败的原因。

A. 征税 虽然税收政策一般不被认为是实现生态农业的工具，但是不好的税收政策干扰了土地谨慎管理的目标。过去，当农民们面对农作物和牲畜养殖的高税负时，他们很少对生态涵养做长期投资，如植树造林、增加有机质和山坡梯田化等。在极端情况下，农民甚至会抛荒。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对农民过度征税是一个问题。2003年，政府将农民的多种赋税统一为总收成的8.4%，这有效地减轻了农民一半的税负。政府也试图阻止地方官员对农民非法的苛捐杂税，但却很难强制执行，因为地方官员并不总是遵守中央政府制定的规则。成千上万的关于农村抗议地方官员非法收费的事件见诸报端。读了这些报道，人们会认为中国农民的过度税负问题可能与地方官员的腐败有关。

但是，中国税收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是普遍存在的，这种不平等始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从

来就没有被赋予征收地方税的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依靠土地买卖和非法收费来获取经费。虽然中央政府近几年开始给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补贴，但是不平衡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农村地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者不得不承担不公平的税收份额。基于生产和消费而征收的增值税，阻碍了生产力，并给穷人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和商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征税是通过地租的方式面向经济富余地区而不是农村地区，如果税收由全国人均水平来分享，沿海地区的收入剩余将会减少，而农村及中国西部地区将会拥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如果国税系统采取这种形式，乡镇干部对农民进行非法征税的压力将会减少。那么，本质上由不平衡的国税系统所造成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也会减少。通过国家土地税的形式从最高层面恢复平衡和公平，将会使得农村生活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农民也不再会拒绝改良耕作方式的经济机会。

此外，城市的土地价值税会降低城市扩张和征用农田的趋势。这项税收将鼓励城市通过增加城市密度的方式，促进城市空间更有效的利用。

B. 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 中国的粮食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务。2000多年来，粮食生产一直被看做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和中央政府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是抵御外来侵略和保护国内粮食供应。历史上实现这两个目标时，国家祥和安定。195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在粮食生产上是自给自足的，并且是

严肃性。但是，粮仓或粮食储备只能作为一项有效的短期措施。中国农民要继续生产足够的粮食、实现国家自给自足，至少取决于三个经济因素：1) 足够多的完全控股的耕地，2) 足够的粮食价格，以鼓励生产，3) 一个经济上支持农村的环境。所有的这三个条件都是不能确定的。

在中国，保持充足的耕地供给是很困难的。城市和工业用地影响到了耕地。虽然，政府规定了农用地占补办法，即每占用一公顷的耕地，就必须整理出另一公顷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但结果是用最好的农用地换取了边际土地（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生产收益正好足以补偿所需费用的土地）。1978到1996年间，约有4%（9940-9950万公顷）的耕地转变为其它用途，如草原、森林，或城市用地。这些土地的减少大部分是在1978到1987年间，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耕地的最好地区。然而，变更耕地用途的情况并没有停止过。之前恢复林地和草地的压力一直在推动耕地转变用途，所以，为维持生态条件而进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造成了耕地数量的进一步下降。在短10年间（1986-1996），中国丧失的生产潜能等于一亿四千万吨粮食（大约相对于过去十年平均粮食产量的3%）。从短期看，加强农业技术可以抵消这一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土地减少将使整个中国的吃饭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土地流失不仅危害国家，它也摧毁了许多农民的生计。在法律上，土地属于集体，农民从集体承包土地。因

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此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干预。

柯布：对中国来说走拉美的道路太危险，那会产生巨大的金融震荡，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后现代农业之路是更为可行的，也更明智。这方面堪萨

斯土地研究院的多年生多作物实验可供借鉴。杰克逊院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为此获得了农业诺贝尔奖。他的研究表明，只须采用一年生单一作物，农业就一定不可持续。而他和他的团队研制的多年生多作物套种的方式则可避免上述问题。

（上接第4版）霞光、小草大树：这特有的泥土清香……

此时此刻，在这诗情画意的清晨，朴素素颜的我们，怀着一片豁然开朗的心境，宛如“人在画中游”一般，沉浸在这自然一景一物中，于是，我们便有了或作诗或歌唱、或手捧圣人墨香净心诵读的本能释放。

世间的什么奢华、名利，全都离我们远去。静静地，我们享受着这不伪伪装、不事雕刻、心神一体的大自然，细细地倾听其绵绵情话……

接着滴滴晶莹剔透的水珠儿，轻轻地晃动着，仿佛演奏一串和谐和音的音符。

脚边有半尺高的玉米苗儿，纤细修长，清翠可人，在雨水的滋润下，格外生机勃勃，蹲下身靠近它们，仿佛能听到它们体内抽枝拔节的声响，这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悸动，正如一群尽情挥洒青春的顽童般，无忧无虑地接受着大自然对于生命的馈赠。小麦成熟收获后残留在地里的半截麦茬儿，则是它们生长过程中最好的肥料，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完成使命的麦秆腐烂为肥料，为新的生命奉献自己最后的一点光芒；而稚嫩的玉米幼苗则是田地里新生的希望，是农民下半年生计的所有！

深深地吸上一口气，胸中便溢满了泥土的芬芳；而这濛濛细雨，也似乎将所有的凡尘琐事都洗涤荡尽。从城市到乡村，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位移，也不仅仅意味着从安逸到艰苦的转换，它更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心田，一个让丰富感性超前于概念理性的气场。慢慢的，雨上双眼，眼前浮现的不再是属于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排光电气，而是一簇簇鲜艳的旧瓦房，一片片青绿的农田……不自

觉地，开心笑容已爬上了每个人脸庞……我们，一群涉世未深的孩子，对许多事情都充满着好奇，在这大地母亲的怀抱中不断地心动着、观察着、求知着。这短短的10天中，我们久已麻木的内心，就像一块缺水的海绵，吸满了水分。我们尽情的徜徉在这片净土之上，贪婪地享受着村民的热情与善良带给我们的愉悦，感受着拨开人情世故的是非非之后的纯净与悸动，紧闭的心扉亦随之悄然开启……此刻的细雨，轻轻的沁润在身上，心上，我们，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心花怒放。

或许，这就是“细雨沁田”的真谛？或许，还有其它？那些深埋于我们心底却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存在，那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得到的感悟……

【1】文章第一部分由何慧丽撰写；第二部分由王斯博撰；第三部分由杨美楠、李娜、甘永祺、何慧丽撰写；第四部分由邹亚婷、王进波、杨雄丁、胡方萌撰写；第五部分由王诗如、刘然、梁爽、梁振华撰写；全文编辑校者何慧丽。

报就是听音乐。而古代人则称“大便”为“大恭”，那是对它抱有敬畏之心的。因为大便的畅通，直接的。现代人不仅管“大便”叫“方便”，对之很随意，而且十个人中有九个“方便”的时候不是看

贴个标签真有那么难吗？

——关于标示转基因食品的加州37号提案

梅君 柯进华

号称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以奥巴马成功连任尘埃落地。随着公投的结束，加州选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提案，37号提案，即“标识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 Labeling)的命运也终见分晓，53.7%反对，46.3%支持。如果此案获得通过，转基因食品在出售时将会有标签注明，禁止在广告中再出现“天然食品”这样意义含混的标示。而肉类和乳品食物，即使是转基因谷物饲料，则可获豁免。有机食物、餐厅膳食及酒精饮品亦不受此限。

这项提案由加州知情权(California Right to Know)非赢利组织提出。它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消费者应有知情权，当他们购买食物时有权知道他们买的食物是天然的还是转基因的。他们自己决定购买哪一类食物。

这个提案曾经呼声很高，极有希望通过。《洛杉矶时报》9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约61%选民支持这项提案，25%选民反对。10月底公布的民调则显示，支持度有44%，仍大幅领先约42%的反对派。这一趋势引起现代工业化的农业公司极大恐慌，选前的最后关键时刻，他们在食品业、生技业的大力帮助下，投入约4600万美元赞助电视广告。其中不乏欺骗、恐吓等不实信息，以误导并进而改变民众的看法。譬如他们恐吓民众，说该提案如通过，加注标签所产生的费用将转嫁到民众身上，其中孟三多种子子公司可拿出\$8,112,866.55，百事可乐资助\$2,485,400，可口可乐资助\$1,690,500。杜邦公司资助\$4,900,000，美国陶氏益农公司资助\$2,000,000，拜耳公司资助\$2,000,000，生物技术公司组织资助\$875,000，卡夫食品公司资助\$2,000,500，家乐氏资助

632,500。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成功了。而他们的对手，有机食品观念的倡导者则只募集到900万美元，只有他们的五分之一。尽管如此，超过两千个组织和业内人士支持第37号提案，其中包括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消费者协会、加州基督教协进会(the California Council of Churches)、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加州护士协会(California Nurses Association)。

所谓“基因工程生物”(genetically engineered organisms)这一术语通常被称为“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简称为GMOs)，它是指用实验室的设备将其它植物、动物、病毒或细菌的基因注入到生命体，改变生命体的DNA。这一改变在自然界中是不会发生的。这些新形式的生命可以自我繁殖并且具有异化授粉的潜力，在鱼类和其它动物中有杂交的潜力。

今天，美国人的食物中大约有40%到70%是转基因食品，比如玉米大豆(corn soybeans)、精制甜菜(sugar beets)、紫苜蓿等。另外，转基因植物中含有原本设计用于杀死杂草的除草剂的残留物，以使转基因植物能抵抗除草剂。过去约15年的研究并没有对转基因食品的长期安全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即新形式的生命对地球大众的平衡不会是有利的，而是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虽然这次公投失败，但双方的票数很接近，更重要的是，许多民众开始注意到转基因食品，开始关注他们的日常食物中是否含有大量的转基因食品。正如此提案的支持者发言人说，这只是开始，这个有关食品安全的运动现在已经在很多个国家，包括欧盟，都要公开转基因生物。加州37号提案只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要求在转基因食品上

加上标签而已。

美国著名后现代农学家，迪恩·弗罗伊登博格博士则从有机哲学的角度对37号提案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他多年前从澳大利亚遗传学家与小约翰·柯布合著《生命的解放》一书的查尔斯·伯奇(Charles Birch)教授那里学到的。查尔斯·伯奇给出忠告：“对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命形式引入生态系统要十分小心。”他的第二条原则来自他的朋友和同事、土地研究所的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博士，他是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MacArthur “genius award”)。他的忠告是，“万一误入歧途，我们要留有一条退路。”一旦转基因的生命形式被引入生态系统，就没有了退路……第三条原则则是联合国的预防原则。当我们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问题时，如果存在疑惑，我们应当谨慎。最后，特别涉及第37号提案的，是我们有知道我们的食物成分的权利。信息透明是基本的。

以他之见，支持第37号提案是使我们的社会责任地处理转基因食品的一个好的开始。这些食品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而且，通过支持第37号提案，我们扩展了对与必然发生的影响相关的、一个更大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即新形式的生命对地球大众的平衡不会是有利的，而是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然而，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凸现，50多个国家，包括欧盟，都要公开转基因生物。加州37号提案只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要求在转基因食品上

发现乡土性(上)

何慧颖等[1]

一、什么是发现乡土性，如何发现乡土性

古人在造字的时候非常慎重。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发现——是很有意味的。发射光也；现，从玉从见，打开玉璞见光彩。可见，“发现”本身就含有把光彩的东西亮开让人看、让人知道的意思。乡土性又该如何理解呢？“乡”即“飨”，本义是用酒食款待别人；“土”，地之吐生物者也，百谷草木丽乎土。性，天命之谓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可见，乡土性，就是指以土为本的百谷草木与人类生命之间的生生不息关系，也包括自己和别人之间的有机关系。发现乡土性，就是展开、亮开“以土为本”的动植物生命本质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这种发现，本质上是一种感受乡土性的“玉”的光彩的意思，也就是说玉本身有光彩，我们只是去走近它、打开它，帮助它发出自身的亮光，让亮光本色地显现出来；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力代替它发出亮光，亮光是人家自有的。发现乡土性，包含了寻找、感受、体悟以乡土之道和价值做支撑的、生生之“理”的意思。

我们下乡的一大任务，就是培养发现乡土性的能力和功夫。

培养发现乡土性的能力和功夫，其方法很简单，就是“尚清”，就是恢复相对于人为雕琢而言的“天然”和“自然”。它在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之间的有机关系之中，在解放身心开发五官潜能的过程中，它触及到了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根本。它并不是外在于心灵的观点、方法、经验、理论之繁多搜集和强化训练，而是一种做减法式的“尚清”的“心思”之滋养，是调动身体五官最彻底、最丰富的直觉感受力，去体悟观照乡村固有的自然和社会，从而还原对乡村的诸多感性、情感、价值、美感，与涉及乡村的诸多观点、理性、思维的“血理”般的有机联系。在对真善美、知情意的呼唤中，在对情感体验和理性思维的关联性修复中，将细琐的现象感性认识整合到具有整体性经验的自觉认识，从而生成一种厚道的有机整体的理性，一种容他的、开放的、关系中的、多样共生的理性，以代替当前流行的片面的、霸道的、抽象的、单一排它的现代工业理性。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与有机整体理性具有“骨肉相连”关系的深度感性的呼唤。

这种呼唤需要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敏锐感。即解放我们的五官，充分发挥它们固有的各种功能和综合潜能。我们的眼睛能辨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光线，并将这些视觉形象转变成神经信号，传送给大脑，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耳朵作为听觉，能听到二十到二万HZ之间来自社会和自然发出的振动之声，诸如铃响、虫鸣、鸟叫、流水、刮风，等等。鼻子作为嗅觉器官，里面有1000多万个嗅觉细胞，有能辨别几千种气味。舌头除了有说话功能之外，上面满布的味蕾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食物的酸甜苦辣。除了眼、耳、鼻、舌之外，我们身上还有大量的触觉，我们的手、肢体、身上的肌肉、关节等等，不只是具有痛觉、温觉和大小形状性质的触觉，而且均具有灵敏的本体感觉和精细感觉。人的各种发现，其首要、基本、重要的标志，是对生命所赐予我们的五官的充分挖掘和尽情解放。

其次是清其心。古人说，“心之官则思”，即将由五官汇聚来的各种神经信号进行综合、过滤、分析和综合，有理有据地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归纳，形成真正建立在粗、伪、此、表之基础上的理的认识，并将经过这种过程的认识通过语言等多种方式表达出来。这二者互为内在的关系，“思”内在的具有在浅度感觉对心田滋养的基础上，经过综合作用而生成深度感觉、并生成有效观点和有理论依据的思。

阐述到此，需强调的是：我们当前的教育现象及其大量表述，并不缺乏丰富的经验、理论、办法；但是，极度缺乏有心田滋养的、五官丰富感受力严重退化，眼睛近视，耳朵听觉退化，嗅觉迟钝，触觉不灵敏了，脑子成了各种想法的跑马场，身体健康也完蛋了。大家忙乱在框定的生活中、知识中和信息中，却迷失了生命、智慧和价值。这样的教育机制造就了生命力萎缩的“理性人”——

“这些理性人，心肠刚硬，想象力匮乏，同情心萎缩；他们受过良好的理性教育，就像用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他们具有显微镜般精细的

首先是敏锐感。即解放我们的五官，充分发挥它们固有的各种功能和综合潜能。我们的眼睛能辨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光线，并将这些视觉形象转变成神经信号，传送给大脑，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耳朵作为听觉，能听到二十到二万HZ之间来自社会和自然发出的振动之声，诸如铃响、虫鸣、鸟叫、流水、刮风，等等。鼻子作为嗅觉器官，里面有1000多万个嗅觉细胞，有能辨别几千种气味。舌头除了有说话功能之外，上面满布的味蕾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食物的酸甜苦辣。除了眼、耳、鼻、舌之外，我们身上还有大量的触觉，我们的手、肢体、身上的肌肉、关节等等，不只是具有痛觉、温觉和大小形状性质的触觉，而且均具有灵敏的本体感觉和精细感觉。人的各种发现，其首要、基本、重要的标志，是对生命所赐予我们的五官的充分挖掘和尽情解放。

其次是清其心。古人说，“心之官则思”，即将由五官汇聚来的各种神经信号进行综合、过滤、分析和综合，有理有据地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归纳，形成真正建立在粗、伪、此、表之基础上的理的认识，并将经过这种过程的认识通过语言等多种方式表达出来。这二者互为内在的关系，“思”内在的具有在浅度感觉对心田滋养的基础上，经过综合作用而生成深度感觉、并生成有效观点和有理论依据的思。

阐述到此，需强调的是：我们当前的教育现象及其大量表述，并不缺乏丰富的经验、理论、办法；但是，极度缺乏有心田滋养的、五官丰富感受力严重退化，眼睛近视，耳朵听觉退化，嗅觉迟钝，触觉不灵敏了，脑子成了各种想法的跑马场，身体健康也完蛋了。大家忙乱在框定的生活中、知识中和信息中，却迷失了生命、智慧和价值。这样的教育机制造就了生命力萎缩的“理性人”——

“这些理性人，心肠刚硬，想象力匮乏，同情心萎缩；他们受过良好的理性教育，就像用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他们具有显微镜般精细的

特点，然而一遇到大事，就变得呆若木鸡”[2]

这样的知识及其学习机制，学了害己，用了害人、害社会；假如这样的知识是正确的，但大家只是简单地拿来，不用“心思”、用行动去深化其精髓，去明白其产生的机理，并上道而行之，那么，充其量只是个皮毛；皮毛性的知识，在变动的辩证的社会和自然世界中，是不够用甚至是不能用的，它使人们很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所以，发现乡土性，不在于乡土性本身，而在于一种遵循发现之道的实事求是的展开过程，是从浅感觉到深感觉，从部分感觉到整体经验，再到一定思维的“心思”过程的践履；它是乡土自然和社会实践过程的不断反复和丰富化的必然结果，是从感性到起点的、关联的、开放的、踏实的动态有机理性的践履过程；不是自作聪明的工具理性、纯粹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践履过程，这样的过程，是身心结合之道、知行统一之道的关键。我们力图在一种做减法的、“尚清”的深刻体悟之中，培养生成有机理性的当代新人。

所以，到乡下去，想帮老乡做点什么事情，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们的世界，了解正题、了解反题，了解乡村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全的、丰富的、心，凭借这样的心，我们才能够形成有凭借的思考。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无所凭空地思考，那叫胡思乱想，古人造的“思”字，从“心”从“田”，有“心”的“田”才叫思，心田里长出的庄稼才叫观点和理念，因此要善于养“心田”。谁去养了这些心田了呢？我们天天读书，我们就胡思乱想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心”了，没有“地”了，那么，不了解农之大理，没有心，又怎么能思呢？现在社会上到处存在的，是大量没有心的思，从不从人出发的思，无情感、无志向、无责任的思！！

道理需要在一定实际状况下的行动去支撑，去踏实。所谓“道不行，不为道；德不做，没有德”(王凤仪语)。常言也说得对，“不怕读书，就怕站”。在当前的下乡潮流中，当更多的大学生仍然采用的是客观理性思维进行证实性人——

想现代人为了赶任务而熬夜，吃没有营养的盒饭，为了票子，房子，车子等等外在的东西而极度透支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确对自己不够厚道。须知，身体没了，就像1000万面缺少了个1，再多的钱也等于零。司徒先生(下转第3版)

(上接第1版)是合作伙伴。它们彼此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相互补充、相互滋养、相互丰富，构成一种内在的和谐。

此外，审美智慧格外注重情。怀特海强调，智慧不仅要求思想的宽度、深度和精确，而且有一个情感的维度。在他看来，如果智力的优秀者中没有充满着对他者的感情、尊敬的态度、同情和慈悲，那智慧是不可能获得的，文明也是不可取得的。情被怀特海看做“人的成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在这样一种审美智慧的观照下，自然得以复魅，亦即复

美。审美智慧教导我们自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尊严和美。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感激他、欣赏他。“她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供我们使用”，它自身独特的价值、自身璀璨的美。对她，我们应心存敬畏，心存感恩。

毫无疑问，要挑战现行的发展模式 and 思维模式，“推动中国的后现代化转折”，从而建构一种生态文明，进行这种审美启蒙，呼唤和培育这样一种高远的后现代的美，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现代消费主义，捍卫精神的尊严，而且对于

克服对农民和农村的歧视，最终在现实层面消解当代中国的城乡对立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现实意义。

因为一个美丽的乡村，种审美欣赏型农村的建立不仅可以极大提高农村人的自豪感，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使他/她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在农村安居乐业，而且将会成为城市人的审美教育基地。因为“乡土生活”，用爱默生的话说，包含着“无限的智慧。”在散文作家苇岸眼里，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

当然，一定有越来越多的不愿做房奴的城里人自愿选择在美丽的乡村工作和生活。因为海德格所栖居的“诗意地栖居”，注定不会发生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中，一定是在厚实而优美的乡村大地上。因为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现代人最匮乏的归属感。可以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这样一来的话，困扰我们朝野多年的城乡之间的界限将变得不再那么清晰。这也应是作为审美启蒙的第二次启蒙的题内应有之义。

这是第二次听司徒先生演讲了。与一般气功大师不同，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守望者”不仅能发功看病，而且有一套深刻的理论支撑。这套理论溯源头是《黄帝内经》，下接活水是当代的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加之自己的

实修内善待自己了。坦率地说，今天的演讲中的许多理论，在我听来依然如听天书，但有一处，我听懂了，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善待自己。就是让我们善待自己的身体，关心它，呵护它。想

欢迎订阅《世界哲学》

《世界哲学》(原《哲学译丛》，双月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中央级学术刊物，是国内唯一一家具有50年历史(1956-2006)的外国哲学翻译和研究杂志。《世界哲学》以繁荣学术为主旨，翻译、介绍和评论外国哲学为己任，50年来翻译和介绍了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的思想，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了解外国发展动向的重要窗口。

2006年1月，《世界哲学》经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审定，入选CSSCI来源期刊，并被国内广泛使用的大型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如科技部开发、维护的万方科技期刊数据库)，同时被列为重点学术期刊。目前，《世界哲学》拥有一个有分量的作者和译者群体，同时又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世界哲学》同仁决心将这个刊物办得更加出色，不辜负广大读者对该刊的殷切期望。

值此新春来临之际，《世界哲学》全体同仁向海内外读者问好，欢迎大家一如既往支持，订阅，惠稿本刊。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编辑单位：《世界哲学》编辑部
主编：李河
主任：鲁旭东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子邮件：wpcass@163.com; wpcass@sohu.com
国内刊号：CN 11-4748/B 国际刊号：ISSN 1671-4318

《世界文化論壇》报

Culture Communication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世界文化論壇》報由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2002年在美國創刊發行。面向兩岸三地及北美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中國文化和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在後現代的多元時代能夠攜手對中國的永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進程做自己獨特的貢獻。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大師訪談、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老外學中文、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以獨特的視角，反映華人的文化訴求，展現不同文化的風采。

文化廣場促進民族文化百花齊放；放眼天下囊括大事春秋世界風雲。美國大觀、洛城夜話，給華人一個活生生的美國，一個細微微的洛城。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看宇宙人生洞若觀火。綠燈人生、成功之道，給人生具體指導。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顯當代大師言傳身教，樹世界華人楷模新風……

《世界文化論壇》可謂大——心若大海、量包天下；《世界文化論壇》亦可謂小——星星之火、步履維艱。

但是如果有一您的份，這份小報就能成大氣候。如果您出一份力，把《世界文化論壇》推薦給親朋好友，讓讀書界人人能夠享受這份思想大餐，這張海外華人文化網路必將因您而玉成。

我們自信《世界文化論壇》是明珠，我們相信您慧眼識得！
《世界文化論壇》一年六期，每期4個版面。
國際標準期刊刊號 (ISSN)：1540-2339

《世界文化論壇》同仁敬啟

《世界文化論壇》報

(雙月)訂閱單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 _____

訂閱費：\$20.00/年(含郵費)

US\$ CASH CHECK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IPDC

P O BOX 2007
CLAREMONT, CA 91711-8007